

# 我的同学侯隽

韩秀琴

侯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1962年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她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农村受到了锻炼成长为一名人民的好干部。1963年作家黄宗英采访了她，曾写了《北京的特别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先后曾任窦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达九年，后任县委副书记、天津团地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当选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

1980年侯隽任天津市人大代表、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宝坻区政协主席。侯隽同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四次接见，周总理六次接见。2002年胡锦涛主席到宝坻曾看望她，她现在身体很好，仍工作在第一线。现将侯隽所写《北京到窦家桥》一文全文录出，以供读者阅读。

回顾下乡以来的生活经历，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命运选择。正是上山下乡和多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是窦家桥的乡亲们给我以厚爱，给我以力量，他们在我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常有许多知青朋友来信，谈到当年如何受到我的影响，其实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下面我就把自己下乡前后的经历谈一谈。

—

下乡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1955年夏天，我当时12岁，在市内的石驸马二小读完四年级，因母亲所在单位搬迁，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京郊的良乡。我转学到良乡北京基建局子弟小学继续读书，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良乡中学。在良乡读初中和高中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农民和农村。良乡是房山区的一个镇，因为地处北京远郊，学校里农民子弟占多数。上初中时，班上只有我们5名来自子弟小学的同学是所谓城里人。农村的孩子待人朴实、热情，学习非常刻苦，看起来很成熟。学校的劳技课，内容很丰富，下乡劳动的机会也特别多。学校的实验园也很有名，记得还拍过电影——《青春的园地》；还养了鸡、鸭、猪，而且自己烧砖建校。良乡中学不放暑假，而是按农时放麦假和秋假。在下农村参加劳动的时候，农民和农村同学吃苦耐劳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阶段的经历，使我对农村产生了最初的好感。

在学生时代，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理想，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儿，曾经想当个音乐家或画家；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又想当个医生；后来对语文感兴趣，便又想当个文学家。在初中临毕业时，我的身体仍然不大好，所以本想不考高中，最好去一所卫校，毕业后当一名医生或护士。可是学校鼓励报考高中，而且要求第一志愿必须报良乡高中。于是，我把良中报了第一志愿，其他志愿都填了卫校和护士学校，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真实志愿，考试时，我还故意漏答了两道数学题。当然，也不敢丢得太多，谁知仍被良中录取了。一年后我家搬回市区，我要求转学，校长不同意，我只好住校，继续留在良中。既然上了高中，自然就立志考大学了。我在高中的成绩一直很好，由于自己的努力，曾两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品学兼优奖章。在毕业考试中，我7门功课都是5分。临近高考的时候，文科的老师劝我学文史，理科的老师建议我读理工。当时自己也非常自信心里打算：“要考就去北大、人大、别的学校还不去哩！”可是在临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考大学上面了，这主要是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关系。

在毕业前的动员会上，校长介绍了国家的形势，号召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是准备升学，继续深造；再就是向王培珍、邢燕子、徐建春学习，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国家的号召，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及老作家赵树理送女儿下乡的情景，都深深打动了。我改变了考大学的计划，决定到农村去。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个人确定什么样的志愿和理想，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首先要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现在党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农业战线是第一线，全党全民正在集中力量加强这条战线。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不也有支援农业的责任吗？我应该自觉地服从祖国的需要，承担最艰苦的工作。于是改变农村贫穷落的面貌，就成为我的最大理想了。

我从小特别“拧”，想干的事情非办到不可。听母亲讲，在不满周岁的时候，大人带着我去公园。我非要自己爬台阶，大人把我抱上去，我便哭闹着下来，然后自己再爬下去。结果弄得满身都是泥土，却感到很高兴。现在我认准了下乡这条路，别人的劝告自然没有用。有部分老师、同学甚至学校的校医都好心劝过我，他们主要是担心农村条件差，生活艰苦，我经受不住。我半开玩笑地说：“所以才去锻炼嘛！”此后，在同学们紧张复习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的是到哪里下乡。也有一些农村的同学，因为功课不太好或是家庭困难，便主动地放弃高考，陆续回到了农村。我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人。在送行的时候也在盘算自己的去处。也曾有几位北京郊区的同学邀请我去他们村子，可我觉得人家一大家子人，我插在里头不大方便，当时下乡虽然是大方向，但没有组织负责联系和安置，像我这样家在城里的想下乡只能是自己联系接收地点。

班里一位同学司福珍，也放弃了高考准备下乡。我们俩是同窗六年的好朋友。她告诉我说，她母亲以前曾在宝坻县窦家桥打过零工，土改时还分得地主两间房子。后来她们全家都迁到北京，但房子还是他们家的，我们俩可以奔那儿。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下总算有了下乡的去处了。

我决定去窦家桥，当时我们都住校，就没告诉家里人。我和司福珍一起打点行囊，兴冲冲地从学校直奔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生产队。那是自然灾害刚过的1962年，当时良乡到宝坻长途汽车站等一宿，转天早晨再乘上午唯一的一趟长途汽车去宝坻。在天津等车的时候，一些人听说我们想去宝坻县下乡，都劝我们赶快回去，说农村可苦了。

在天津吃早点的时候，一些饿急了的人伸手就抢我们的东西吃。看到这种情况，我更加认识到建设农村、大办粮食的重要，也更坚定了下乡的决心。

## 二

我们来到窦家桥村以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竟是接收问题，厚道的村干部接受了司福珍，因为她总算跟窦家桥有点关系，可是不肯接受我，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收留。但是我们并不死心，到村以后就每天去地里干活，和大家渐渐熟悉了，乡亲们都非常喜欢我。当时，我借住在回乡青年张俊峰家里，司福珍天天晚上去找村干部对付，说服他们留下我。张俊峰也帮她一起去找支书“蘑菇”，后来他看实在没戏了，就想出了个鬼点子，对干部们说：“人家那闺女比大姐来得还硬气呢！她是福玉的对象，将来还不是咱村的人？”司福玉是福珍的弟弟，还在北京读书。这样的理由本来不存在，也说不过去，但奇怪的是干部们居然相信了，而且迅速同意接收我。村书记恍然大悟地说：“我早就说嘛，没有关系，人家城里人怎么会来乡下吃这份苦。”因为当时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北京跑到陌生的窦家桥村来。

1962年7月10日，我回北京迁户口时，才向家里公开了选择。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突然，但没人表示反对，因为我要干的是一件很有志气的事。母亲只是提醒我说：“这件事你可想好了，真要去一阵子后悔了，半途而废，我可没本事把你调回来。”我坚定的说：“我不会半途而废的。”父母亲考虑我在农村没有收入，表示只当我上了大学，每月寄生活费给我。我迁了户口，还带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就匆匆回到了窦家桥。乡亲们见我们果不食言，真来当庄稼人，全村人像办喜事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和司福珍虽然估计到会有很多困难，但是绝没有想到困难会如此的难以克服。不仅天天下地干活，累得我们腰酸腿疼，手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而且一天到晚还要做三顿饭。我俩都不会用柴禾做饭，只好天天瞎对付，夹生过火、盐大碱小地填了肚子了事。虽说队里在田粮上还照顾我们，每天按8两分配，可由于当时没有副食，再加上我们“不会过日子”，所以一个月的粮食几天就吃完了。那时候队里还分给我俩点自留地，自留地里种的红薯，很小的时候就刨出来煮着吃了。这样过了一个月，司福珍对我说：“这口粮要是一个人吃也许还行，我先到蓟县老家住几天，秋后分了粮食我再回来。”我想了半天，只好同意我这个伙伴暂时离去，可是司福珍到蓟县不久，当地招聘代课教师，她就留在那儿教书了。

我住在那间小土房，矮得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后墙外边的地面比屋里还高，又是东厢房，所以冬天冷，夏天热，又湿又潮。赶上雨天，房顶到处漏雨所有的盆盆罐罐都得用来接水。雨下得时间长了，雨水还会从耗子窟窿渗到屋里来，我就在地中央挖一个坑，把水汇集起来再淘出去。窗和门都是用秸秆插的，很不结实，糊的窗纸被风一鼓荡就破了，所以冬天要糊许多次窗户。那时，窦家桥还没通电，回家还得推碾子推磨，把原粮加工好再去点油灯做饭。

说来也怪，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一没觉得寂寞，二没觉得烦闷，而且天天特别高兴，觉得生活得挺充实、潇洒，真是境由心造。你对生活很热爱，你也就能真正以苦为乐。我天天下地时捎带着书报，歇晌的时候就给大家读报、讲故事。看到乡亲们那专注的眼神，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已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我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做饭。村里的小青年们吃完饭就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帮着我推碾子，帮着我做饭。然后嘻嘻哈哈地看着我吃饭。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炕上坐得满满的，院里还站着十几个，我们就屋里一句屋外一句地聊着。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姑娘主动跑来和我做伴，小小的坑上，挤得身都翻不过来。青年们爱到我这儿来，一开始是因为新鲜，我刷牙漱口，他觉着新鲜；我吹口琴、唱歌、他们也觉得新鲜。那时村子里也没有别的热闹，我好像就是“热闹”。有几天真没粮食吃了，晚上收工回来就不做饭。咋办呢？饱吹饿唱！我就躺在床上唱，唱《洪湖水》什么的。原来，饿着肚子唱歌显得嗓音特别好。从此，我就经常和伙伴一起唱歌，我的小院里常常充满了歌声。

司福珍离开以后，她母亲觉得对不起人。后来司福玉从学校毕业了，也要求下乡，于是，他母亲就支持他到窦家桥来，说可以照顾照顾我。他是1963年来到窦家桥的，刚来的时候也是自己做饭。由于他不会做，也是一顿糊两顿生的，我为了照顾他，就让他一起吃。村里人对此也有议论的，可我一直没往心里去，一直到县里的老田同志下乡蹲点，正式提出我与司福玉的关系问题，我才认真地考虑。我觉得他人挺好，而且我原来曾假借过他的名义，现在不同意，不成了“变心”吗？后来我当支书时，司福玉当副支书，我认为他实际上比我能干。以后他还当过一段县委副书记，因为我的问题，也挨过一段整，现在是县粮食局的工会主席。

我们有个女儿，今年17岁了，正在读高中，由于我太忙了，顾不上照顾她，她从小就自己玩。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只是有时遗憾地说：“要是妈妈不是县长该多好，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

### 三

1963年，黄宗英大姐来窦家桥，在我那间小厢房里住了20多天。上午她跟我们一块儿去地里干活儿，中午帮我做饭，收拾房间，下午写作。这期间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在召开，黄宗英也出席了。当周总理请赵丹、张瑞芳、黄宗英等人到家里作客时，黄宗英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总理当即肯定说：“这是个方

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并让黄宗英写文章宣传我的事迹。不久黄宗英大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送到《人民日报》社，但迟迟没能发表。当周总理了解到是因我的家庭包袱出身问题而不能发表时，明确表态说：“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她向着光明，向着新社会，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青年带起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1963年6月《北京姑娘侯隽下乡落户一年被称为“特别姑娘”》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963年7月《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河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又发表多篇访问记和报道，天津地委还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我一时间成了“名人”，被当作“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农村”的典型，广泛宣传，并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地、县的先进青年、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和农业先进工作者。1964年6月我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在开幕式的那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工作人员特地把我们20几个青年排到了边上，并且叮嘱说：“照完相以后，你们都跟我走。”

我们随工作人员去了一个会议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在那里，准备接见我们。我跟毛主席握手时，非常激动地说：“主席您好！我们全村的干部群众问您好！”可是走到周总理跟前时只想哭，我知道总理一直关心着我。总理没有见过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怕哭出声来，抑制着自己，声音很小地回答：“我叫侯隽。”总理还没有听清，其他同志就走过来和总理握手了。事后我当然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1965年3月，我到天津开劳模会，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也来到了天津并参加了会议。在主席台上周总理看到邢燕子，就问她：“侯隽来了吗？铁姑娘来了吗？”燕子告诉周总理：“她们都来了，在下面呢。”台下有的听见了总理的问话，赶紧告诉我说：“总理问你呢。”我看着台上的周总理，心中十分感动，但是我不能上台去见总理。过了一会儿总理就离开了会场。我两次见到周总理，而且亲自感受到总理的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我既感到幸运，又觉得懊悔。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总理，但决心踏下心来好好干，要对得起周总理的关心。

1966年我光荣地入了党。三年以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选举时全票通过，我还投了自己一票。我想，有了生产指挥权，就可以科学种田，更好地实现自己改造农村的愿望了。这时，村里最大的难题是改造盐碱地。我和群众一道，用深井的水浇碱，使旱地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水浇地，实现了园田化，也彻底改造了盐碱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大搞秸秆还田，让土地松软增强肥力，使粮食亩产由1964年的400斤达到了千斤。我们还组织了副业，窦家桥群众的生活明显地比周围的村富裕了。

我那会儿又要搞生产，又要开会作报告，忙得不可开交，本来身体就不大好，这下更显着精力差。心里还总想着多干点儿实事，多参加点儿劳动，可身体受不了。有一回，《人民日报》的记者王炳奎到村里采访，我坐在坑上靠着被

子跟他说，他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记。我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过一会儿，醒来一看，王炳奎正坐在地上看表。我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怎么睡着了，你怎么没叫醒我呢？”王炳奎说：“我看你是太累了。”我那时干活就怕停下来，在地里干活只要说该休息了，我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有一次，省长到村里看望大家，我们坐在那儿听省长讲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实在是太紧张了，也太累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天不亮就去给五保户挑水，除自留地的草……，等于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人怎么能受得了。王炳奎回去写了一篇“内参”，反映了这个问题，被周总理看到了。总理当时在昆明，刚刚访问 14 国回来，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打电话到国务院，通知天津地区和河北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此定下：我要外出开会作报告，必须由天津地委批准才行。

1971 年我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看病，《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了我，并发了一个通讯。周总理看到这篇文章，知道在北京住院便让秘书找我，因为不知道是哪一家医院，等一家一家地找到我时已是夜里 11 点了。医生把我叫了起来，说周总理接见，我迅速赶到大会堂，总理的秘书告诉我：“总理正在开会，开完会要接见日本外宾，你也参加。”我等了一会儿，总理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没有见过你。”我说：“见过。”总理惊讶了，问：“什么时候？”“我在共青团‘九大’时见过您。”总理又关心地问起我所在村的情况和家族情况，我一一回答，总理很高兴。

“文革”初期，我也曾一度受到冲击，但是不久随着部队“支左”就被解放出来了。在那段时间里，总理很多场合提起我，经常过问我的情况，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仅从 1971 年到 1975 年我就四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71 年 5 月 7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日本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特意安排我在场。总理接见外宾整整两个半小时，还利用外宾到来前和送别后的机会和我们在座的三个农民代表谈了近一个小时，其间和我就交谈了将近 20 分钟，总理关心地询问了我们村改造盐碱地的情况和知青的生活情况。总理是那樣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无拘无束地向总理一一做了汇报。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在那个年月里，像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文革”中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还能多次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出席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有了总理的精心安排和关心爱护啊！

#### 四

197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因是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不寒而栗一封信，说孩子下乡的困难。毛主席寄了 300 元钱，还附上一封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解决知青的困难。我和邢燕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也参加了会。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江青表现得烦躁不安。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照照镜子，一会儿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一会又点着一张纸，引得火苗窜起老高……。

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且称赞干得不错时，江青突然插话：“还有一个好青年，他叫张铁生！”总理立即打断她的话：“这样的好青年到处都有。”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1974年江青来天津视察时，听市委第二书记吴岱汇报。吴岱举学大寨先进典型的例子时，有宝坻的小靳庄。江青听说村里办夜校学唱样板戏，很感兴趣，就要到小靳庄去。以后小靳庄就定为江青的“点”。江青每次去小靳庄，市委都要通知邢燕子和我去小靳庄陪她。

1974年夏天，我正在党校学习，接到市委通知，让我马上回到小靳庄陪江青视察。江青穿着连衣裙，白高跟皮鞋，戴着大草帽。当她看见当地农民都戴着一种尖顶草帽时，问我：“你有那样的草帽吗？”我说：“有。”江青立即让我去拿来跟她换。可窦家桥离小靳庄有50多里地，我怎么能回去拿草帽呢？于是，我就找到小靳庄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你们小卖部有卖那种草帽的吗？”王作山说：“有。”我说：“你赶快找人去替我买一顶来，再帮着缝个帽圈。江青跟我要这种草帽。我上哪儿拿去？”

跟王作山说完，我又跑去坐着听江青说。江青问：“你怎么还不赶快去拿帽子啊？”我也实在，回答说：“我家离这儿特别远，他们去小卖部买草帽了。”江青听了很不高兴，说：“你不要我这顶帽子了，是不是？我这草帽还是延安时戴的呢！你不要，我就不给你了。”我说：“怎么不想要啊，只是我家离这儿太远了，拿不来。”江青讥讽地说：“我看你都快成小官僚了。”我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说：“这顶帽子是我在延安时代开荒生产时戴的，很多人跟我要，我都舍不得，现在送给你和燕子俩人，你们轮着戴啊。”我看看那顶草帽，心想：接得慢点，帽子就变成两个人的了。一会儿给我买来了草帽，身边的人帮着缝了个小帽圈，我就把它送给了江青。我当时觉得江青送的草帽代表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便把那帽子送到了村史馆展览。

1976年我当了3个月的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说清楚”却有一年多。1977年12月16日，我重新返回窦家桥村。从天上掉到地下，我觉得应该。我本来就应该在地上，不应该上天。我接着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79年。村里群众传我可能要调走，闹得我也不塌实。我干脆找到县领导问清楚。县领导回答说：“知青连以上干部都要安排工作，你也不例外。”可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村，我觉得在村里干得不错。群众为我着想，说：“叫去就去，哪怕干一天就回来呢，也说明咱们没问题。”

1980年我离开干了18年的窦家桥村，到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非常投入地干了10年。

1990年组织又调我到县政府当副县长，让我分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兼任宝坻红十字会会长。根据县里情况，我从1994年开始，在全县范围搞了9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募集90多万元，又争取到“邵逸夫工程”捐款40万元，为残疾儿童建立起一座特教学校。

1996年底，县里又让我分管外经贸，1998年又让我分管农业。不管干什

么，我都坚持按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工作。

## 五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会到，教育就是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必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青年人有一个在艰苦环境锻炼的机会，对他的一生都有好处。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我们就不可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考虑问题。不接触一段农民，对农民没有感情，也就很难谈得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扎根农村，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建设着社会主义农村。我最初曾经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后来又成了一代知青建设农村的典型人物。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我经过了更多的磨炼，既当过多种多样的官儿，也踏踏实实地务过农。但是，由于有了深厚的农村生活这个根底，由于我对农村和农民的热爱，也由于有了绵绵不断的农民群众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也很踏实。

知青生活对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几十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毅力，使我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荣辱、苦乐的考验，能够把名利、地位看得很淡。过去，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窦家桥村参加劳动搞科学种田，为窦家桥村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我在县里担任职务，实际上也没离开农村，是在更大范围内为农村、为农民服务。我将永远不改初衷，永远无怨无悔。